

从南阳卧龙书院历史沿革探析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兴衰

□ 刘 灏

书院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中一种很有特色的教育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代,衰亡于清末,存在近千年之久,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

卧龙书院,又名诸葛书院,是为纪念诸葛亮躬耕南阳,弘扬“淡泊宁静”、“不求闻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而修建的庙学。卧龙书院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南郊卧龙岗上的武侯祠内,这里南濒白水,北障紫峰,山水相依,景留四时,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立祠祭祀之所。卧龙书院倡建于元至大二年(1309年),是至大年间(1308—1311年)全国兴建的四所书院之一,也是唯一依祠而建的书院,元仁宗颁额曰“敕赐诸葛书院”。卧龙书院规模宏大,历元、明、清三代,屡经兴废,传承有序,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现存建筑群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阳知府罗景所建,以“卧龙书院”命名并沿用至今,今天它正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阳武侯祠的一个重要景点对外开放。

纵观卧龙书院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兴—衰—兴—衰的曲折发展过程,反映了不同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对书院采取的不同政策,见证了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兴衰史,是整个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发展的缩影。

一、书院制度的萌芽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

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随之形成了官办与民办两类。唐代最早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早期的官办书院还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而是唐王朝藏书、校勘、整理与修书的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1]唐代还设立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设置时间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建于贞观九年(635年),比官办的集贤书院(725年)还早90年。其余书院都在开元十一年(723年)之后所建。民办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但也有些书院出现了教学活动,如吉水的皇寮书院,漳州的松州书院,德安的义门书院,奉新的梧桐书院等等。虽然这些具有授徒讲学活动的书院,在当时并不普遍,规模较小,也未形成规章制度,但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已经开始萌芽了。

二、书院制度的确立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兴干戈,学校废,而礼义衰”,许多读书士子穷居草野,无由显身。宋既统一海内,书院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初期,朝廷忙

于武功,无暇文教,没有充足的实力兴学校。为了适应“士病无所于学”,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进行讲学,以满足士子们就学读书的要求,培育人才。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著名书院建立并发展起来,既满足了读书人的求学要求,又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宋初四大书院。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到了南宋,官办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2]朱熹也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批判官学“但为声利之场”。官学如此败坏,学生学不到“义理”,或“德行道艺之实”,所以私人讲学的书院,又应运而起,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这时在社会上日益风行,讲学活动频繁,于是又出现了大办书院的高潮。这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几乎取代官学而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关。据统计资料显示,宋代书院总计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3]。由此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猛。古代书院的规模和制度也就是在南宋时期才正式确立和完备,它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也是在南宋时才更突出地显示出来。

三、书院制度的兴盛

元代的统治者相当重视文化教育。早在太宗八年(1236年)行中书省杨惟中随从伐宋,广泛收集伊洛诸学,集于燕京,设立元代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明令提倡书院:“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4]这不仅缓和了原宋朝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而且

争取他们为元朝服务,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发展元朝的文化教育事业,从而大大促进了元代书院的发展,全国复建、新建书院蔚然成风。南阳卧龙书院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元武宗敕建的,落成后又由元仁宗赐名,朝廷对书院重视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敕建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载: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南阳郡,率官吏长老伏谒武侯祠下,顾瞻徘徊,怅然兴怀,提议应“建庙学而尊祀之”。遂命地方官吏兴其事,“审制席地之舆,设官养士之宜,上于省以闻,报‘可’。”至大二年(1309年)春即工,于武侯祠东隙地建“庙学”。历时三年,于皇庆元年(1312年)秋落成。延祐二年(1315年)经中书省平章政事秦国公孟与翰林集议奏请,元仁宗为书院颁额曰“敕赐诸葛书院”,命翰林学士承旨赓书之,翰林学士承旨钜夫为碑文书篆。书院在格局方面与全国其他书院基本一样,有“庐舍”、“学田”两部分,庐舍主要有礼殿、祠堂、讲堂、书斋、藏书阁、山长属、诸生斋、库庖等建筑共计46间。孔庙因旧制,殿曰“大成殿”,门曰“大成门”。因书院是为纪念诸葛亮而建,以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材,非志无以成学”(《诫子书》)之遗训,讲堂曰“静成”之堂,东序曰“明志”之斋,西序曰“广材”之斋,书阁曰“崇文”之阁,合之曰“诸葛书院”。学田是书院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由佃户承种,岁入租税则充作教师的俸薪和书院设备整修、添置的费用,诸葛书院“割官之废地四十顷籍于学”,这在当时全国众多的书院学田中数量是较多的。设置山长一人,主持书院事务及教学。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书院历经“四十星霜,风雨震凌,瓦木腐落”,时任山长负时达揖请南阳知府庄文昭修葺诸葛书院,同年冬,知府庄文昭命鸠工重修,使“废者撤而新之,无者补而完之”(元张继祖《敕赐诸葛书院增修学宫之记》)。所有建筑整理一新,塑像匾额着色重绘,并加筑周垣,制祭器百余件,又建东西斋房各三楹,增塑了蒋琬及武侯子瞻、孙尚塑像,标著十将名额,使孔子庙、武侯祠、诸葛书院浑为一体。诸葛书院达到空前的规模。

从卧龙书院的设立及规模等都能体现出元

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与提倡。据王颢《元代书院考略》统计,元代书院共有408所,其中新建134所,再建59所,共建193所。在408所书院中除9所尚无法知道其所在地点外,其余399所则分布于全国13个行省中的7个行省,依次是:江浙行省167所,江西行省80所,中书省55所,湖广行省42所,河南行省37所,陕西行省9所,四川行省9所。由此可见,有人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元朝统治者在汉代大儒的建议下,对理学非常尊崇。太宗十年(1238年)为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特于太极书院建“周子祠”,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飨。还曾诏令一些蒙古国子生跟随许衡学习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元代统治者的“治国安民”之道。各级学校增读朱熹提倡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平列,规定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四书”以朱注为准。从此理学不仅成为元代的官方统治思想,明清各代亦然。确定了理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有的书院还教授其他学科,如南阳府博山书院设有数学、书学,濮州历山书院设有医学,鄱阳县鄱江书院设有蒙古字学等,这在元朝书院中是颇具特色的。元朝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因此,一方面元代的书院在数量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给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

州、县学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泊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尽管如此,元代的书院对于当时文化教育的普及,理学的传播,以及人才的培养,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书院制度的发展

据清罗景所辑《卧龙岗志》记载,卧龙书院在明代曾有过三次修葺。成化八年(1472年),南阳知府段坚重修祠宇,复书院旧观于故址东,择士以教。弘治八年(1495年)河南参政顾福分守南阳,檄知府马舆、知县李通重修,弘治十一年(1498年)四月至八月,书院增建堂庑各四楹。嘉靖六年(1527年)南阳府署再次整修诸葛书院,“制增于旧”,书院重臻兴盛。此后终明一朝再无记载。卧龙书院这三次整修印证出了明代书院所经历的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发展过程。

明朝初期从建立至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130余年间,全国的书院处于沉寂状态,其主要原因是明朝政府重视官学,提倡科举,使明初官学呈现兴旺发达的局面。一般士子也因官学待遇优惠,科举前程荣崇,不再热心于书院。对于书院,明王朝是既不提倡,也不修复,任其自生自灭。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教育空疏,逐步变成科举的附庸。一批士大夫为救治时弊,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逐渐冲破沉寂,开始兴盛,从而勃兴发达起来。其中理学大师王守仁、湛若水对明中叶以后书院的迅速发展起了直接



卧龙书院 广材斋



卧龙书院 静成堂

的推动作用。王、湛均为明代中叶的理学思想家,王守仁主张“致良知”,湛若水则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为了宣传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在其所到之处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王湛死后,他们的众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宣传其学说,建立书院更多。据曹松叶统计,明朝书院共计 1239 所,其中嘉靖年间最多,占总数的 37.13%,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其次,占总数的 22.71%。以民办和官办计算,民办的占 18.98%^[5],与宋元两代相比下降很多,民办书院逐渐为官办书院所代替。这种趋势,到清代更加发展。明代书院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书院和科举关系更加密切。“书院官学化”的程度比元代更甚,有的和官办、州县学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李铃复兴白鹿洞书院,其院生皆为南康在泮诸生;有的书院山长就是儒学教官兼任;有的书院课程,明文规定为“四书”、“五经”之义或进而求史之类。到了万历年间,书院就有了月课月考的规定和分配科举名额的待遇,白鹿洞书院每月给学生三钱银,后改为按月考成绩给银,每遇大比之年,给两个名额入试,后增为五个,最多时到四十二名。第二,明末官方“禁毁书院”。由于明代书院的教育以“会讲”为特点,弥漫着自由讲学的风气,敢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这样就遭到了统治者的忌恨,自明中叶以后,书院曾先后四次遭到当权者的禁毁。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 年);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 年);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 年);第四次是天启五年(1625 年)。明代对于书院所以会出现“官学化”和“禁毁”两种对立的情况,正表明了明朝统治者利用书院为其服务的两手策略,能够纳入官学轨道就予以保护,不能纳入就加以禁毁,同时也是明王朝专制集权主义的表现。第一、二次的禁毁之举,主要是针对王、湛之学的传播。《明通鉴》卷五十七载:嘉靖十六年四月“壬申,罢各处私创书院。时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故有是命。”第四次禁毁则是针对东林书院。万历年时,被明政府革职的户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他们针砭时事,评议政治,抨击当权者,得到许多在野士大夫以至一批在职官吏的

“遥相呼应”,形成一股反对当朝的政治势力。经过激烈的斗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终于禁毁东林书院,逮捕、屠杀了一批东林党人。东林案后,明代书院从此一蹶不振。

五、书院制度的衰落

至清代,为了防止人们利用书院讲学,聚众成势,反对清朝统治,清政府一开始便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6],因此清初九十年间,自顺治元年(1644 年)至雍正十一年(1733 年),书院是沉寂的。这一时期的南阳卧龙书院“荆榛弥望,竟不可得”。康熙年间,清政府逐步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对于书院通过赐匾额、赐书籍的方法,加以褒扬。虽然还没有兴办书院的明令,但清代书院已逐渐由沉寂走向复苏。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南阳知府朱璘在南阳卧龙书院“徘徊垣外,求书院故址,荆榛弥望,竟不可得”。次年,由豫抚阎兴邦捐俸金与南阳知府朱璘重修,中建讲堂,旁建



卧龙书院 书院匾额



卧龙书院 明志斋

斋舍,后建“三顾祠”,内祀武侯,以司马德操、徐元直配之。庖廩门寝,无不具备(清彭始抃《重修诸葛书院碑记》)。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卧龙书院又圯,惟存后阁,上供文昌。知府罗景因堪舆之说和府之绅士之请,另建书院于武侯祠之前,依旧制重建。置讲堂两序,旁各翼两庑,后建大殿,殿后又建数楹,以供饮食之需。并环以周垣,建造门楼,额曰“卧龙书院”,即今日保存之书院建筑。

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的“上谕”中明令全国提倡书院,确认书院是“兴贤举才”之举,要求督抚于各省会创办书院,并提供经费。政府在积极倡设书院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不仅控制书院的设立,掌握书院的经费,还控制书院师长的选聘权,控制书院的招生和对生员的考核,书院制度发展到这时已经完全官学化。大多数书院教育同化于学校,中心任务已转向考课,讲学之风消失,毫无生气可言,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庸。但也有少数书院在乾嘉以后,受到汉学兴起的影响,由一些汉学家主讲其中,多以“朴学”教授学生。清著名学者阮元设诂经精舍于浙江,设学海堂于广东,不课八股文,而以经史为主,并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科,为书院开创一种新的学风。此外,还有以诗词文章为重点的书院,如沈归愚主讲紫阳书院,提倡词章之学,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提倡桐城派的古文等。

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腐败不堪,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奏请《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认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1]清王朝采纳张之洞、刘坤一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八月初二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改设为学堂。从此,延续千年的古代书院制度即宣告结束。南阳卧龙书院在这一大的历史趋势下疏于管理,已是颓垣断壁,时任武侯祠第二十一世方丈的李耀山(至仁)将书院三楹转让给信阳道台黄小宗改做“黄家祠堂”。民国27年(1938年),第二十三世方丈张宗骞将卧龙书院旧址及53亩果园交于南阳县政府,改建为河南省南阳园艺学校。至此,南阳卧龙书院已是名存实亡,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卧龙书院残存建筑一直被非文物部门占用,直至2002年才归还武侯祠,由南阳市博物馆进行管理。该馆遂对卧龙书院建筑群依旧制进行落架大修,恢复了大成殿、静成堂、广材斋、明志斋等四座建筑28间,组成一进结构严谨的清式建筑群,使之重新焕发光彩,作为武侯祠的主要景点对游人开放。

六、结 语

书院最早源于私人讲学,后经官方提倡、赞助逐步形成书院制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特有的教育机关。虽然历代统治者都曾采取种种措施使之官学化,但毕竟与官学不同。一般情况下,书院是反对科举的,但也常常受到科举制度的强烈影响,甚至变成科举制度的附庸。每当书院作为独立的教育机关,与官学

(下转 80 页)

度。藏品登记分类混乱、入库排架无序、编目统计不清、建档内容不全等现象严重。

二、基层博物馆管理建议

中小型博物馆的发展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具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管理对于发展建设中小型博物馆也具有非常重大意义。

1. 博物馆的制度管理

博物馆必须采用一套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可操作性强,责、权、利相配套的管理构架,采取“集中管理、统一协调”的管理模式。绩效考核工作作为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个方面,旨在通过对员工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作成绩、工作态度及出勤情况的考核,实事求是地发现员工的长处和不足,进而扬长补短,改进提高,促进管理工作的公正和民主,通过奖优罚劣,提高工作热情及工作效率。对全体员工实行分时段、分层次考核,同时采取员工考核与薪酬管理相结合的手段,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效率就会得到较大提高。

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员工进行不同内容、不同方式的教育培训,传授员工基本业务知识、劳动技能和对劳动组织、管理体系的认识。同时,对上岗员工实行在岗继续培训,内容包括职业导游培训、日常普通话培训、服务英语培训、服务礼仪培训、紧急事故预演和各专业技能培训等。

2. 缓解博物馆资金压力

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单位,首先需要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文物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其二,要保证专项经费专用。目前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未专款专用的现象很多,资金大多用于提高职工待遇等方面。其三,基层博物馆要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本地相应的特色藏品资源,努力把博物馆推向市场,吸引观众,或多方面地加大产业的开发,获取经济收入,缓解资金压力。

3. 提高责任意识

首先,领导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特别是法定代表人要对馆藏文物的安全负责,建立文物保护情况报告制度,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藏品的保护保管情况,要层层签订责任状。其次,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积极宣传藏品保护的意義,鼓励和培养一批热爱文博事业的从业人员。其三,转变传统观念,提升思路,要利用文物的本身价值,提高博物馆门票的附加价值,发挥藏品的社会功能,让博物馆走向学校、走向社区、走向社会。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市博物馆)

(上接 37 页)

相对立存在时,书院的特点就表现得比较明显;反之,官学化加强了,书院与官学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封建社会创立了书院制度,但书院制度的许多特点又为封建专制主义所不容,并且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没落,书院制度或者丢掉自己的特点,名存实亡;或者保持自己的特点,遭到统治者的禁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要想保持和发展书院制度的特点和它的优良传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书院制度,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对发展新时期的新教育是有益处的。

[1]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

[2]《宋史·选举志》赵汝愚绍熙三年(1192年)奏折。

[3][5]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集,第111~115期,1929年12月~1930年1月。

[4]《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6]《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

[7]《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博物馆)